

唐代福州的对外贸易

卢美松（福建省文史研究馆 福建福州 350001）

由于历史原因，唐代福建历史发展情况的记载极少，有的也只是残篇断简的零星资料。福州因为是首邑，所以有些材料涉及，但也非系统记载，有的内容甚至有不同解读，更增加了认识的难度。这里仅举部分唐代诗文与碑志资料，作为窥见那时福州社会风貌的参考。

晚唐包何有《送李使君赴泉州》诗一首，云：“傍海皆荒服，分符重汉臣。云山百越路，市井十洲人。执玉来朝远，还珠入贡频。连年不见雪，到处即行春。”诗人描绘“泉州”处近海荒服之地，终年不见下雪，到处温暖如春，与中原远隔云山，乃百越聚居之地。不同的是，市井中多海外夷人，他们或是执玉来朝的远方使者，或是频繁入贡的商客。重要的是包何所送李使君的身份。唐代使君即指由朝廷派出、到地方任观察使、经略使、节度使的封疆大吏，有的也尊称大夫。包何诗中所称“李使君”到“泉州”赴任福建节度使。这是唐诗中描写福州为数不多的诗篇之一，也是难得的研究唐代福州历史的珍贵材料。诗中生动描写当时“泉州”海外夷人来寓及朝贡的史实，被研究福建海外交通史与贸易史者所重视，频繁引用，多方解读。事实上，其中的释说有一些或是误读，或是曲解，其缘由皆因对泉州与福州建置沿革历史未作深悉，或对古人于地名称谓的作古习惯未予审察，尤其是对诗中所写内容尚乏研究，所以未能准确领会诗意，故有加以考察与辨析的必要。

首先应当知道，今日的福建省会福州，自古以来就是福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教育的中心，尤其是行政中枢和军政长官的开府驻节地。自先秦时代的闽越国起，福州就是地方独立王国之都。秦始皇于统一六国后，曾废去闽越王无诸的王号，设立闽中郡，实则“弃弗属”，但这仍不能抹杀冶城（今福州）在闽中的中心地位，历史学家对闽中郡治在福州多有共识。闽越国历史的延续，不因秦汉政权之更迭而中断，当

刘邦立国之初，即承认闽越国的存在，“复立无诸为闽越王，都东冶”。尽管《汉书》的记述称“冶”，但人们至今均已承认冶与东冶实际皆指今福州地。

西汉后期闽越人自立的冶县，与东汉朝廷建置的冶县（“旧记”又载，东汉光武帝时设东侯官县），其治所都在今福州。东汉末改冶县为侯官县，名义上以一县而辖闽中全境，其首邑之地位也未改变。到东汉末年，分侯官县之北乡新置建安（今建瓯）、南平、汉兴（今浦城）诸县，侯官遂与其他各县分治。三国至南朝，先后在今建瓯置建安郡，在今福州置晋安郡（晋泰康三年，公元282年），在今南安丰州置南安郡，继续对闽中地域实行分治。南朝宋泰始四年（468）改为晋平郡，南朝陈永定初年（557），升晋平郡（原晋安郡）为闽州（治今福州），并设刺史官以领晋安、建安、南安三郡，树立了闽州在全闽地域内的行政统辖权。从此而后，尽管闽州的名称数变，但其在闽中的中心地位再也没有变更。

隋唐之际，今福州建置改动最多的是名称，如陈光大六年（疑为元年，公元567年）改闽州为丰州。隋朝建国后于大业初（605）又改丰州为闽州，三年（607）又改闽州为建安郡（治所在建安县，即今福州）。唐朝立国武德元年（618），即改建安郡为建州，四年（621）移建州于建安（今建瓯），六年（623）析置泉州，八年（625）置都督府，领泉（今福州）、建（今建瓯）、丰（今南安）三州。至唐景云二年（711），又改泉州为闽州，并置“闽州都督府”，领闽、泉、建、漳、潮五州；圣历二年（699），以武荣州为泉州（今泉州地），隶属闽州都督府。唐开元十三年（725），复改闽州为福州，并设全闽区域的一级行政机构——福州都督府，先领有泉州，后陆续领有开元二十四年（736）设置的汀州、武后垂拱二年（686）设置的漳州、乾元三年（760）设置的建州。开元二十一年（733）置经略使，上元元年（760）升

为节度使，领州六、县九。大历六年（771），罢节度、都督，置团练观察处置使。

开元以后所设福建经略使与福州都督府并立，后来（福建）经略使又复为福建节度使，均开府建牙于福州。唐末五代，王审知治闽，在福州建大都督府；其子王延翰建“大闽国”，以福州为国都。北宋设福建路，元代设福建行省，明代立福建承宣布政使司，清代设福建省，皆以福州为首府或省会，主政官员皆驻节福州。宋、明末帝流亡入闽时，也分别在福州建行都或帝都。凡此皆足证福州在全闽地域历史上的地位，因此称福州为全闽都会、八闽首邑，诚然是实至名归。据《三山志》记载，宋代福州城内曾建“闽都坊”，可见福州称闽都其来久矣。

福州在唐代以前的地名，先后有闽州、丰州之称，唐代开始又有建州、泉州、丰州、武荣州和福州之称。并且自隋代以后即为使君、方帅开府驻节之地。因此，诗人包何在前诗中尊称李使君为“分符重汉臣”。因为根据古代旧例，朝廷任命都督、方帅、牧使到地方任职，均是分符授命，“使君”应命到福州开府履职。包何即因此而为新任节度使李使君致贺并送行。在这首送别诗中，包何称李某所到任所为“泉州”，实指福州。因为古代文人作诗属文，常要引经据典，如以“分符”代指封疆大吏持节到地方建牙任职。而对地名称呼同样常用古称，以示典雅，故以“泉州”代指福州。因为在那时，泉州（指今泉州）并不是“分符重臣”的任所和驻节地。

由此诗可知，福州至少在中唐以后即是王朝在东南地区的重镇，是海外交通发达、对外经济贸易繁盛之地。“市井十洲人”，生动说明域内居民已有诸多外邦之人。对此可供佐证的，有晚唐裴次元刺史于元和八年（813）所作《球场山亭记》的碑刻，其残文中有记载：“海夷日窟，风俗时不恒”，“麇闹阗阗，货贸实繁”。这十分清楚地表明，当时福州城内有许多海外“夷人”寄寓，各方来市的货物十分丰富，贸易十分繁荣。因为外国留寓人多时久，以致影响了市井的民俗风情，这一记载是颇为耐人寻味的。重要的是，碑记还生动地记述道：“迺时麇闹阗阗，货贸实繁。”表明当时福州城内诸货丰盛，贸易发达，市场繁华，市井嘈杂。而此种情形在今泉州出现，据记载当在宋代以后。陈叔侗先生认为：“泉州成商港，实未见于唐史料。”据考，包何是唐代润州延陵（今江苏丹阳）人，登天宝进士第，大历中为起居舍人，其时代当在公元742年至779年之间，虽不确知此诗作于

何年，但其时代当在中唐。

另外，晚唐人薛能也写过类似的送别友人到闽中任节帅的诗，题为《送福建李大夫》，诗句中也写到福州的情形。诗曰：“洛州良牧帅瓯闽，曾是西垣作谏臣。红旆已胜前尹正，尺书犹带旧丝纶。秋来海有幽都雁，船到城添外国人。行过小藩应大笑，只知夸近不知贫。”诗中除称颂李大夫的品德业绩外，特别点到新任福建牧守所住之地是海外贸易的发达之区，只要海船一到，城内随即增添许多外国人。其所描述情形可与包何诗及“亭记碑”的内容相互发明与印证。此中值得注意的是，诗叙“只知夸近不知贫”，表明远在东南边陲的闽中地区，在当时已是著名的富庶之乡；较之地近中原的“小蕃”，不知要强过多少，其原因就在于闽地已有发达的海外贸易。当然，李大夫的开府驻节之地，同样是在福州。据考，薛能是山西汾州人，所送李大夫即为李晦。《旧唐书·僖宗纪》载：乾符二年（875）四月，“河南尹李晦，检校左散骑常侍兼福州刺史、福建都团练观察使。”可见距包何作诗约百年之后，福州仍为唐王朝的重要对外贸易口岸。李晦赴任途经徐州，其时薛能任徐州感化军节度使，故诗称李晦是“行过小蕃”，他自惭远不及闽海福州之富庶。

还有一首值得注意的涉闽唐诗，是马戴的《送李侍御福建从事》诗。全诗曰：“晋安来越国，蔓草故宫迷。钓渚龙应在，琴台鹤乱栖。泛涛明月广，边海众山齐。宾府通兰棹，蛮僧接石梯。片云和瘴湿，孤屿映帆低。上客多诗兴，秋猿足夜啼。”全诗描述闽地之地理环境、气候现象、物候特征，特别对历史、文物的表述，说明作者对福建历史比较熟悉。此中值得注意者乃在于，一是对李侍御所到的任所福州，沿用旧称曰晋安，并追述古闽越地历史风物，说明诗人习惯用典故；二是讲到福州边海多山，可见波涛、岛屿与帆船；其三最重要的是作者指出，在福州即使是接待宾客的府第，也是近在江海岸边，可直接通行船只；而从海外来访的“蛮僧”，也要登石梯以进庙堂。这从另一角度，即海外交通、宗教文化交往方面记述了当时福州的社会状况。同样也应了《球场山亭记碑》中所记述的“海夷日窟，风俗时不恒”的景象。

此诗的写作时间也在晚唐。据记载，马戴（799～869）是定州曲阳（今江苏东海）人，会昌四年（844）进士，仕至国子监太常博士，工诗善文，与薛能等有诗篇往来。他作诗送别的李侍御即李远。据考，开成四年（839）闰正月，有卢贞大夫出镇福建，李远也当

于其时赴卢贞幕，为从事。《太平广记》卷175引《闽川名士传》载：林杰“父为闽府大将”，林杰“至九岁，谒卢大夫贞……无不嘉奖，寻就宾见，日在宴筵。李侍御远、赵支使容，深所知仰。”可知李侍御确为卢贞大夫的幕僚李远。

唐朝廷重视南方各地的政教，同时重视南方沿海的对外贸易与外交关系。据记载，唐大和八年（834），文宗皇帝下诏，指示沿海各地军政官员，“南海番舶，本以慕化而来，固在接以恩仁，使其感悦”，为此要求“其岭南、福建及扬州番客，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。”这样的时代背景就是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繁荣兴盛的重要条件。

时过两百多年后，北宋文学家曾巩知福州军州事。任内他四出游历福州城内外山川寺庙，并多有诗作，其《圣泉寺》诗有句云：“蹑履路通林北寺，落帆门系海东船。”说明其时福州城外闽江边仍多来自“海东”如朝鲜半岛、日本国等地来的贸易船舶。其《乱山》诗也有句曰：“莫问吾亲在何处，举头东岸是新罗。”曾巩自注称：“福州际海，东岸即新罗诸国。”

《图经》亦云：长溪与外国接界。”可见他的“海东”、“东岸”云云，皆指东海之外与中国有文化贸易往来的新罗、高丽、百济及日本诸国，与前文唐诗、唐碑所记恰相印证，说明福州港海外贸易持续不断的繁盛情形。

根据《新五代史·王审知传》记载：“海上黄崎，波涛为阻。一夕，风雨雷电震击，开以为港。”这黄崎港就是甘棠港。《王审知墓志铭》称：“一夕，风雨暴作，霆电呈功，碎巨石于洪波，化安流于碧海。敕号甘棠港。”重要的是，铭文还指出：“至今往来蕃商，略无疑恐。”表明福州甘棠港（即黄崎港）在其时前后对海外的贸易均十分繁盛。据宋梁克家《三山志》地理卷记载：黄崎港之开凿，当始于唐昭宗乾宁五年（898），至天复四年（904）方克成功，“昭宗诏奖之，赐号甘棠”。对于甘棠港的方位，志书也有详细描述：“一（指长溪，又称西溪）出政和县界，经麻岭至缪洋三十里，至廉村，会龙泉溪，南流为江，过甘棠港，黄崎岭。”明王应山《闽都记》卷33载：“甘棠港，在黄崎镇。港上接东平、秦溪、穆溪、大梅溪诸水，南出古镇门，入海。”并称：“今有甘棠二公馆。”由此可知，甘棠港（黄崎港）应在今福安之甘棠与下白石之间，其时尚无今之连江黄崎名。唐

天祐三年（906），敕建王审知德政碑，碑文盛称王审知治闽业绩，其文有称：“闽越之境，江海通津。帆樯荡漾以随波，蒿楫崩腾而激水。”铭文有句曰：“黄崎之劳，神改惊涛，役灵祇力，保千万艘。”足证当时闽中江海通津，海外贸易船舶极多，而黄崎港之开辟，作用巨大，可使水陆无滞，“商旅相继”。据记载，唐天复元年（901），王审知在下令大修福州罗城的同时，也在今马尾闽安镇修建迴龙桥，邢港（迴港）大约也就在这时得到修浚。这是比较靠近福州的重要贸易港口。

综上所述，至少在中唐以后，福建特别是它的首府福州，在对外贸易与海外交通方面十分发达，经济也十分繁荣。它在汉代东冶港的基础上，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东南地区重要的贸易港口，也是中古时期福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蒿矢。当然，福州作为掌握福建军政大权的首脑机关驻地，不仅经济贸易繁荣、海外交通发达，其政治、文教的兴盛应是重要的基础。关于这方面的情况，在地方志书与碑刻资料中皆有反映。据记载，福州文教从中唐以后开始有很大进步。据河南洛阳关林博物馆保存的《大唐福州刺史管府君之碑》记载，管元惠于唐开元“十七年（729），除使持节福州诸军事、福州刺史兼泉建等六州经略军使”，即前引诗篇中所称之“使君”“大夫”“牧帅”等。管刺史在福州驻节，“既执藩柄，又壮军麾”，“聿敷朝化，诱彼闽越，俗成邹鲁”，福建因此始有邹鲁之俗。其后续有李椅、常袞，“兴学劝士，文儒汇征”。据记载，大历七年（772），李椅为加御史大夫、持节都督福、建、泉、汀、漳五州军事观察处置都防御等使。唐独孤及撰《福州都督府新学碑铭》称：李椅“以五经训民，考校必精，弦诵必时。于是一年人知敬学，二年学者功倍，三年而生徒祁祁，贤不肖竞劝，家有洙泗，户有邹鲁，儒风济济，被于庶政。”其碑铭赞颂曰：“公之移风，始绍黉宫……比屋为儒，俊造如林。缦胡之纓，化为青衿。”文句虽不免夸饰，却生动记述了李椅劝学之功。建中元年（780），常袞以故相为福州观察使，同样重教兴文，奖掖文士。由于历任主政官员的倡导与努力，福建（特别是福州）儒风兴盛，学者倍增，文教发达已无可置疑。这种社会背景与以上所论述的福州对外交通贸易的发展相辅相成。由此可以反映出福建在唐代中期以后社会发展的概况，反映出作为首府福州的政治地位和社会风貌。